



川上未映子著 高一君译
《夏物语》
上海译文出版社

生育的思辨题

□张怡微

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读日本纯文学类别的小说了，我倒是很喜欢读日本的推理和科幻作品，在去年的专栏中，推荐了不少我喜欢的作家。在去年的专栏里，我们谈到了如秋吉理香子或零井修介的小说，透过悬疑的剧情，可以看到作家对日本各个年龄层女性处境的描述。但在这方面谈得最深入、文学手法最激进的，确实还是韩国女性文学的长处。以上是我的刻板印象，直到我最近读了一本有趣的小小说集，川上未映子的《夏物语》。

我不了解这位作家，几个月前出版社希望我为她的新书做活动，我婉拒了。原因也比较单纯，我没有生育经验，看营销材料，我误以为《夏物语》又是一本讨论母职艰辛的流行小说。读完后我很意外，因为它想到很多从前读过的日本文学，例如角田光代的《我和纱有美》。2019年，我在上海国际文学周与角田光代女士对谈，这是继早前台北书展后我第二次见到她。我挺喜欢她的故事，因为她总能娴熟地回避掉被社会科学定义的标签，把痛苦还原成人性本身的缺陷。同是讨论人工干预生育的话题，《我和纱有美》聚焦了几个非自然生育的家庭，畅想20年后，这些被生下的孩子们怎么看待自己的来历，怎么看待自己素未谋面的生物学父亲、出走的养父，因自己的出生而解体的家庭……小说里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刻，角田光代写，“我们都太轻看幸福了”。

《夏物语》的主结构有两部分。第一部的时间定锚于2008年的夏天，书中有三个贫困的都市女性——坚持写作但生活拮据的夏子、接近40岁想要隆胸的卷子和她独自抚养的六年级女儿绿子。夏子和卷子是一对姐妹，母亲早亡，父亲出走，承担着沉重的抚养义务的是祖母，后来祖母也因为癌症过世。小说开篇就写贫穷，非常细致地量化衡量贫穷的尺度（一家人共有几户窗）。就连学校远足费用都难以缴清的家庭，唯一的女性长者卷子为什么会坚持要花钱隆胸，实在是奇怪的事情。在卷子女儿绿子的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更年轻的视角来观察女性身体，包括月经的来临、对于生育的想象，和对于家族中两个女性生存范式的怀疑。第一部分写得最好的是在东京年轻女性的生计和稀少的生存可能，另一个特色在于对于乳房和排卵话题的关切，经由对女性身体的复杂认知来折射变化的外部社会思潮。例如，夏子对许多从事女扮男装行业的女性或喜欢女性的女性进入到女性公共浴室就有很多辩证的想法。这种看法是认同问题在新时代必然会涉及的伦理讨论。同样的讨论还延伸到第二部，夏子和几位已婚已育的老朋友讨论如果丈夫需要，是否愿意捐出自己的一颗肾。小说写得非常利落，大部分女性尽管不愿意但仍然勉强同意，而唯一一位坚持说“我不愿意”的女性，在聚会解散后走到地铁站的路途中就决定不再与其他女性继续来往。从表面来看，这个场景很荒诞，它像一个简单的人性实验，表现道不同、不相为谋。但“要不要给丈夫捐肾”被作家提炼出来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选择题，就很有意思，仿佛这是女性世界的政治取向。从这方面来说，川上未映子确实打破了我对日本女性的刻板看法。值得注意的是，第一部的情节几乎脱胎于她的另一部成名作品《乳与卵》，《乳与卵》曾获得2008年第138届芥川龙之介奖。

小说第二部分，川上未映子重点谈的文学话题就是单身生育。这是一个非常前沿的议题，有生育欲望但没有婚姻的育龄妇女，如何在理性和实操中实现自己的愿望。小说一方面为日本读者做了知识性的普及，另一方面也努力在小说的文学布置上建立女性创作者孕育作品的过程与承担单身生育之间幽微的隐喻关系。我很喜欢读第二部分小说的原因，当然是感受到了同为女性创作者的艰辛。小说中男性编辑的傲慢和轻蔑，以及写作者创作本身进展的不顺利，都写得十分生动和贴心。被男性编辑认为毫无文学天赋的夏子，因缘际会将那本被看扁的书卖成了畅销书，这柳暗花明的喜悦与对新作准备的忐忑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极其类似38岁女性生育焦虑的氛围。在某种意义上，她们已经被“那些男人”放弃了，只能自己相信自己。虽然被主流社会认为是完蛋的，但她们心里知道，还有机会。机会的触发机制，是需要两个选择中作出判断：“丹麦精子银行，维尔科曼”，和“没有孩子的人生”。

与其说，夏子是对剥离性欲的生育保有想象，不如说她对创造“存在”这件事具有天然的好感。无论是写作，还是生育，都是让不可见变得可见，让不存在的孩子获得存在。值得珍惜的是，作家是通过辨析建立对女性自我的认知，从而论述单身生育可能性，而不是将单身生育当作绝对的目的。



太宰治著 竺祖慈译
《女生徒》
译林出版社

幸福隔夜才来

□陆远

和本书的译者竺祖慈先生一样，我基本上是在飞机、列车和长途巴士上完成了太宰治小说集《女生徒》的阅读。

2024新年伊始，与几位朋友约了去北海道游历。当我们坐上札幌新千岁机场开往小樽的普通列车时，夜幕已徐徐降临，窗外的雪意也越来越浓。在车厢略显昏暗的灯光下翻开《女生徒》，很容易被带进作品中——就像竺先生说的，不是进入情节故事，而是进入其中浓烈的情绪。

这些年，太宰治在中国读者中已是炙手可热的人物，他颓废、阴郁的风格颇能与当下某种精神潜流暗相呼应，再加上互联网的过滤、削尖和放大，称为日本文学在中国读者云集的第一人大概也不为过。若论在普通读者中的影响力，“日本近代文学三驾马车”的夏目漱石、森鸥外、芥川龙之介早已瞠乎其后；“日本现代文学三驾马车”中的另外两家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恐怕也望尘莫及。然而出于对畅销品的某种警惕，我此前对太宰治却并没有太多阅读的兴趣，倒是此番在雪国阅读《女生徒》，尤其“女性之歌”的七个短篇，有了别开生面的体验。

这七个短篇立足女性视角，描写女性精神世界，剖析女性内心情感，属于太宰治娴于应用的女性自述（或称女性独白）文体。太宰治的性格中具有明显的细腻、纤弱、敏感气质，在传统以男性主导的性别角色规范中，这种典型的“女性气质”是一个“正常”的男人应该竭力避免的。某种程度上，正是因为在这样的现实世界中“失败”与弱势，反而促使太宰治由此“退后一步”，尝试将女性自述的叙事方式作为一种特别的文体应用到创作中。借助这种独特的文体，太宰治对女性的刻画不再止步于外部观照，而得以进入内心世界展开深描，在感知和表达女性时也能拥有超乎一般人的敏锐，获得大部分男性作家鲜有的视角。在《皮肤与心》中，太宰治以一个新婚少妇的口吻，淋漓尽致地道出女性感性胜于理性、身体胜于思考、冲动胜于克制的特质：“对女人来说，眼下每一天的日子就是自己的全部，这与男人不同。女人既不考虑自己的身后之事，也无任何思索，唯愿实现一时一刻的美好。”“女人的一生，常常取决于她当时的发型、衣物图案、瞌睡程度或者身体上的某些细节。”“男人对身上长的东西可以满不在乎，可是女人却是仅凭皮囊而活的。”“女人就是靠着美的愉悦而活着，哪怕那种愉悦只是瞬间的感觉。”……就像纪伯伦说的那样，当两个人交谈的时候，她们什么话也没说；当一个女人自语的时候，她揭露了生命的一切。

然而，千万不要认为太宰治的文学抱负仅止于“为女性代言”，某种程度上，他笔下的“女性特质”是被夸大乃至建构出来的（想想《皮肤与心》中那个因为过敏就差点崩溃的少妇），作家的野心也许在于，通过这样的“性别操演”在既定的社会规范之外寻找重新审视和反抗日常秩序和权力格局的可能性，实现其“反俗”的意图。《干代女》开宗明义的两句话，“女人毕竟没用”，“话虽这么说，却另有一种暗黑而顽固的东西根深蒂固地盘踞在我内心一隅，觉得自己总有一点可取之处”，既是全篇矛盾冲突的总括，也暗含着对父权社会既定性别结构无声的批判。《蛭蛭》中的少妇，面对咸鱼翻身暴得大名的画家丈夫，极尽嘲讽之能事：“抱歉，我虽也什么读不懂，但至少还想说自己的话，而您呢？难道真的没有自己的嘴吗？否则怎么会净鹦鹉学舌呢？”而当挖苦上升为呵斥——“您真卑劣，刚在那位了不起的老师面前点头哈腰，一转眼就说出这种脏话，真是疯了”——时，与其说是在展示一对夫妻渐行渐远的价值观，毋宁说是对扭曲人性的社会系统的控诉。

作为全书篇幅最长，分量最重的作品，《女生徒》在20世纪文学史上自有其地位，正是凭借这部作品，太宰治作为新晋青年作家开始受到公众认可。《女生徒》并非完全是太宰治的原创作品，而是其对19岁少女有明淑日记的裁剪加工，将几个月的日常点滴和少女心事浓缩为主人公从清晨睁眼到晚上入眠一整天的“意识流”。与坊间普遍的理解不同，在我看来，尽管小说的主人公已成为30年代女学生的代表形象，但这篇小说的核心主题恰恰不那么“女性”。通过女学生自述展示的那种“摇摆不定的自我意识和偶尔的厌世心理”，实际上是20世纪人类共同面临的基本精神困境，用太宰治自己的话说，这就是“幸福隔夜才来”的苦恼——“苦苦盼着幸福，终于性急难耐弃家而去，第二天幸福的喜讯造访这被遗弃的家，已经为时太晚”。《女生徒》的结尾说，“我们不会再见了”，《等待》的结尾则是“您哪天终会看到我的”，看似大相径庭的情绪，表达的是同样的失落，人类无法真正掌握命运的失落。

删人快语



西蒙娜·德波伏娃著 袁筱一译
《黑暗时代三女哲》
南京大学出版社

三女哲与黑暗时代

□蒯乐昊

法国人西尔维·库尔廷-德纳米的哲学著作《黑暗时期三女哲》为我们标注出了上世纪最为黯淡混乱的十年：1933—1943。其关键的时间节点有二：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登上了权力的最高层，书籍被投入了熊熊烈火；1943年，华沙犹太人居住区的起义遭到镇压，人被投入了熊熊烈火。

人类史上的至暗时刻里，经济大幅度衰退，政治形势极度混乱，多个国家被卷入战争，欧洲四分五裂，仇恨和激进的声音此起彼伏，新兴思潮和政治实验层出不穷。“法西斯主义和种族观念合流，在这个时期，诺言受到嘲弄，条约遭到践踏。”

三位女哲人就生活在这样的时代里：埃迪特·施泰因、西蒙娜·韦伊、汉娜·阿伦特，她们在年龄上相差无多，其中施泰因最长，生于1891年，阿伦特和韦伊则分别生于1906年和1909年，黑暗时代到来之时，她们正处于一生中的风华鼎盛。在封面上，三女哲无一不是眼神清亮、容貌过人，折射出精神性的光芒，如微火试图穿越暗夜。

在1933年黑暗即将降临时，埃迪特·施泰因已经嗅到危险，她预感到一场新的浩劫将降临到她的族群，她向教皇进言，恳求教皇为犹太人颁布一道通谕，也许这会成为某种保护，但她没有得到来自教皇的任何答复。

汉娜·阿伦特从一开始就保持了战斗的姿态，她对希特勒口诛笔伐，并积极参与社会政治运动，投身于犹太复国主义，虽然她不想跟犹太传统有任何瓜葛，也根本不想归属于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集体。她那著名的理论——“平庸之恶”，至今仍是一把掷向法西斯极权的尖锐短枪。

西蒙娜·韦伊始终拒不承认当时的反犹主义或种族主义是什么前所未有的新玩意，在她看来，那不过是某种反犹太教思想的变形，相比针对犹太人的极权，她更反对帝国主义的极权，尤其是殖民地问题和工人阶级所受的压迫。

她们在学术思想上并不趋同，但选择她们三人作并列研究，并非偶然，她们身上确实存在着大量的共同性，除去都是女性这一显著特质之外，她们三人都是犹太人，在那个特殊的时代，仅仅这一出身，便意味着她们一生的命运注定与众不同。她们都是哲学家，当时哲学普遍不受重视，但是三位年轻的才女很快就证实，她们的抉择是正确的，在即将到来的岁月里哲学正要大行其道。她们三人都经历过困苦童年，也都是天才的学霸少女，都有着杰出的老师：胡塞尔、海德格尔、阿兰，也都以离经叛道著称，而她们都敢于批判老师，并试图超越老师。她们在年轻时都对神学萌生过浓烈兴趣，结束哲学求学阶段，她们都成为教师，但教书生涯都在希特勒上台后被迫中断。她们的著作，也始终与时代同步，那是怎样的时代啊：夹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革命、民主主义、帝国主义、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反犹主义……复杂的社会思潮，构成了三女哲激情思辨的社会土壤。

她们都被迫经历了逃亡，汉娜·阿伦特先去了法国，后来又去了美国，并最终加入美国籍，西蒙娜·韦伊先在自由区马赛避难，后来也去了美国，最终在英国伦敦病逝，临死前还在为自己到底要不要受洗而纠结万分。埃迪特·施泰因命运更为多舛，她曾逃亡到荷兰，但未能躲过纳粹的大清洗，她和姐姐一起被押往奥斯维辛集中营，最终死于毒气室。

她们的命运互相交错，与时代形成共振。她们不但是黑暗时期的见证人和受害者，也是积极参与演出的观众，不懈的行动者和斗士。“三人都不可忽视，都令人瞩目，都为一种强烈的愿望所驱动，这个愿望就是要了解一个怒气冲冲的人世间，要和这个世间和解，无论哪个都要爱这个世界，爱命运，爱世界。”

生于黑暗时代，苦痛大于幸福，人无法选择他所处的历史周期，只能选择自己在这个时代中要成为何种角色。正如韦伊在写给友人的一封信里所引：被人称作斯多葛派的希腊哲学家曾经说过：“应该爱命运，应该爱命运所带来的一切，甚至爱命运所带来的一切。”

当施泰因和她的姐姐被纳粹抓捕，押出修道院，押往集中营的时候，她用自己的语言念出了：“希伯来人是，我也是。”她鼓励姐姐，“走吧，为了我们的人民，去吧！”

而人类的命运：最终是一个共同体。

远见近拾